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曾涌现出无数以善于用兵而名垂青史的杰出人物，但影响最大的、被民间广泛誉为用兵如神者仅有两位。一位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一位就是一代伟人毛泽东。

《三国演义》在民间影响非常之大，但它是演义，是小说，而非史书，记载三国时期历史的真正史书是《三国志》。笔者认为，诸葛亮是被《三国演义》高度神话了的历史人物，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是当时最杰出的政治家，治理蜀国很有一套，但其并无过人的军事才能。《三国演义》说诸葛亮未出茅庐而知天下三分，火烧赤壁后料到曹操必从哪条道逃走，死后安排马岱杀死意欲造反的魏延等等，描绘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太过了，鲁迅先生“状诸葛之多智而似妖”的评语，可谓一针见血，一语中的。

而毛泽东非凡的军事才能是被历史证实了的，是举世公认的大军事家。在漫长的戎马生涯中，毛泽东指挥战争战绩多多有如神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战争奇迹。许多人认为，毛泽东之所以总打胜仗，靠的是其超人的智慧与妙算。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过什么神机妙算。那么，毛泽东用兵如神的奥秘究竟是什么？

如今，由于早已过了保密期，一些尘封的档案已公之于世，那些隐蔽战线英雄的历史功绩也终于可以大白于天下了。解密的档案终于解开了扑朔迷离的历史之谜：真正帮助毛泽东屡打胜仗的“法宝”是知己知彼的情报工作。

1976年深秋，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当时的中央调查部长罗青长谈起了情报工作说：“《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破获了他们的密码。”

寻找西方代言人

经过了清末革命家不遗余力的宣传推广，睡狮很快就成了一个通用的政治符号，不仅模糊了知识产权，甚至模糊了它的所指，只要说到疲弱的中国、蒙昧的中国、潜力的中国、甦生的中国、崛起的中国，几乎都可以使用“睡／醒狮”来指代。

尽管有许多证据说明睡狮论源于梁启超的《动物谈》，但是由于梁启超与同盟会等革命团体在政治主张等方面的分歧，革命宣传家从一开始就有意屏蔽了梁启超的开拓性贡献。留日学生的《江苏》杂志，在1904年的一篇时评《德人干涉留学生》中特别提到：“德人者，素以瓜分中国为旨者也，数十年前，德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已有男醒东方睡狮之言。”这说明至少在1904年，革命宣传家已经开始寻找外国政治家作为睡狮论的代言人。

1910年的《台湾日日新报》曾发表一篇“翻译”文章，假冒英国人的语气说：“盖今日之清国，非复前日之清国，睡狮已醒，怵然以大烟为深戒。”该报又有文章说：“昔日某西人，论清国之音乐，其言曰：支那人实不愧睡狮之称也，舞楼戏馆，茶园酒店，无一处不撞金鼓。”还有文章称：“纽约《地球报》称，人言清国为睡狮已醒者，伪也，彼亚洲之狮，实今日犹酣睡梦乡也。”

1911年的时候，曾经有人对睡狮论做过追问：“西人言中国为睡狮，狮而云睡，终有一醒之时。以此语质之西人，西人皆笑而不答。于是乎莫知何何取义矣。”作者到处向人打听睡狮论的原始意义，均无答案，可知在清末的睡狮论中，不仅拿破仑还没有出场，已经出场的曾纪泽、俾斯麦等人，均未取得睡狮论的主导权。但把睡狮论的知识产权赠与“西人”，大概已经成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说法。

盖因国弱言轻，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自成一家之言的话语权，“惟告以英、德、法、美之制度，拿破仑、华盛顿所创造，卢梭、边沁、孟德斯鸠之论说，而日本之所模仿，伊藤、青木诸人访求而后得者也，则心悦诚服，以为当行”。明明是中国人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概念，却偏要请西方人代言，似乎非如此则无语无力。这大概是近百年的屡战屡败之后，国人积弱成疾的屈辱心态之必然反应。

拿破仑最终胜出

拿破仑与睡狮寓言相结合的具体时间很难锁定。留学美国的胡适曾在1915年写过这样一段话：“拿破仑大帝尝以睡狮譬中国，谓睡狮醒时，世界应为震惊。百年以来，世人争道斯语，至今未衰。”可知当时的美国留学生已经将睡狮论归入到拿破仑名下了。不过，这一说法在国内似乎不大流行，朱执信1919年的《睡的人醒了》仍将睡狮论归在德国政治家名下。

粗略统计，至1920年，睡狮论的代言人已

揭开毛泽东用兵如神之谜

长征期间曾任红三军团长、红一方面军司令员的彭德怀说过：“凭着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和出色的侦察工作，才免于全军覆没而到达陕北。”在万里征途中，红军时时受敌重兵围追堵截，却未中过一次埋伏，在国民党军设置的包围圈中都能准确地找到空隙钻出，这主要是依靠电台侦察及时掌握准确的情报。

在万里长征中，敌军从未停止围追堵截，只有数万人的红军时时有被强大的敌人“吃掉”的危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情报工作是生命线，事关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红军长征的先头部队中，有一批侦察兵，抓舌头、化装探路立下了大功，不过这类侦察一般只能了解到普通情报，只具有战术价值，很难了解到敌军高层计划和整体部署。在长征途中不间断地侦破国民党的密码，才是红军情报工作的重中之重。破译密码，可掌握敌军的动态与行踪，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

当时红军尽管各方面条件都很差，但谍报水平并不逊色。长征中的红军之所以能在无线电侦察中取得杰出成就，归功于中共中央对电讯工作的远见卓识。1929年，周恩来便在上海秘密组建无线电人员培训班，并委托苏联帮助训练了一批电台工作人员。苏联的无线电侦破和保密技术，在世界上已处先进之列，中国共产党的无线电通讯工作从建立之初，便体现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本国人员艰苦奋斗相结合的精神。打入国民党高层和特务机关内的中共中央特科人员，也智取了敌核心部门的一些密码本，不仅以此译出许多重要情报，也掌握了其编码规律。

进入上世纪30年代，中共中央在苏联和国内培训的电讯人员被分派到各支主力红军中，他

们结合学到的技术和获取的敌情，又结合实践刻苦钻研，终于掌握了破译敌人密电码的独特方式。

长征之前，从1931年的第二次反“围剿”开始，红军情报组织便开始截获破译国民党军的电码，使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在指挥反第二、第三次“围剿”时对敌情了如指掌，所以连连挫败敌人的“围剿”。不过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各部大都在苏区周围相对固定的位置作战，主要靠有线电话指挥，红军便难以全部掌握敌军的指挥和部署情况。第五次反“围剿”惨败后，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央红军被迫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开始后，敌我双方的军队都在时时运动之中。由于当时国内没有建立有线电话网，蒋介石对国民党军各军、各师下达命令主要通过无线电报发送。此刻，红军的电码破译活动达到了最高潮，敌军的电令大多数都能截获，破译成功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例如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台长宋侃夫，内部外号“本子”，意思是他拿到电台收到的国民党军电码，不用查对密码本，便能心中有数地把它的内容念出来，基本上不会有差错。

每破译敌人一个高密度的密电，中央红军的安全就增加一分。在中央红军长征时，负责电讯侦察的军委二局提供的一个个准确情报，帮助中央摆脱了危险。如湘江之战后国民党军在湘西设下口袋阵，一渡赤水后川军以三十多个团在长河南岸准备拦截，过大渡河前敌军在大树堡一带布有重兵等情报，都使毛泽东等领导人下决心迅速改变前进方向。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高度评价和赞扬曾希圣和他领导的军委二局说，没有二局，红军长征

施爱东：拿破仑从未说过中国是“睡狮”

经有了特指的拿破仑说、俾斯麦说、威廉说，以及泛指的英人说、西人说、外国人说等，此外还保留着梁启超所提到的曾纪泽说、乌里西(吴士礼)说等等。不同的代言人之间，无疑形成了一种潜在的竞争关系。

随着时间推移，世界形势不断变化，俾斯麦和威廉这些二流政治明星已经很难激起新生代的传播兴趣。而拿破仑的种种英雄业绩在各大媒体均有介绍，20世纪上半叶活跃在中国媒体的西方政治明星中，拿破仑可谓稳坐头把交椅。在口头传播中，只有公众熟悉的共同知识，才能为传播者所理解、接受和记忆，那些日益冷僻的知识和名字，很快就会被淘汰。1930年代，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存亡之际，睡狮论再次获得广泛传播，这一次，拿破仑终于脱颖而出，成为睡狮论的惟一代言人。

“睡狮论”来龙去脉

“睡狮论”源于西方基督教话语中常见的“唤醒东方论”，先是被清末外交家借用来阐释中国的外交姿态，继而被梁启超化用，并创作了一则关于“唤醒睡狮”的寓言。清末革命宣传家将“醒狮”立为民族国家的象征符号，将之应用到各种民族主义宣传之中。在各种宣传包装之下，“睡狮论”逐渐融入到民众的口头传播当中。

唤醒论的由来

在中国，拿破仑睡狮论可谓妇孺皆知。可是，许多西方学者曾经彻底翻检过与拿破仑相关的原始资料，发现“无论法文或其他语言的任何一手资料，都没有记载拿破仑曾经说过这句话”。美国学者费约翰建议将唤醒中国论的发明权归于曾国藩的长子、著名外交家曾纪泽。

1887年，曾纪泽在欧洲《亚洲季刊》上发表“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中国先睡后醒论)，文中提到，“愚以为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也”，鸦片战争虽然打破了中国的安乐好梦，然而终未能使之完全苏醒，随后乃有圆明园大火，焦及眉毛，此时中国“始知他国皆清醒而有所营为，已独沉迷酣睡，无异于旋风四围大作，仅中心咫尺平静。窃以此际，中国忽然醒悟”。据说此文发表之后，“欧洲诸国，传诵一时，凡我薄海士民，谅亦以先睹为快”。

但是唤醒论并非曾纪泽的发明，也不是针对中国的专利，日本、印度、韩国等东方国家，全都不约而同地被西方基督教文化所“唤醒”过。唤醒论是东西方对峙的文化语境中，基督教文化对

于整个东方文化的一种居高临下的论调，是“文明社会”对于“前文明社会”优越感的表现。曾纪泽是个基督徒，他借用了唤醒论作为话题入口，目的在于阐述中国温和而不容欺侮的外交姿态。

据一位美国学者的大略统计，从1890年到1940年间，美国有60余篇论文与30余部著作在标题中使用了“唤醒中国”这样一种表达方式。可是，这些标题中所提及的唤醒对象往往是“中国龙”或“中国巨人”，从未有过“中国睡狮”的意象。那么，睡狮意象又是谁的发明呢？

宁选睡狮不选飞龙

梁启超1899年的《动物谈》讲了一则寓言，第一次将睡狮与中国进行了勾联。梁启超说自己曾隐儿而卧，听到隔壁有甲乙丙丁四个人正在讨论各自所见的奇异动物。某丁说，他曾在伦敦博物院看到一个状似狮子的怪物，有人告诉他：“子无轻视此物，其内有机焉，一拨按之，则张牙舞爪，以搏以噬，千人之力，未之敌也。”还说这就是曾纪泽译作“睡狮”的怪物，是一头“先睡后醒之巨物”。于是某丁“试拨其机”，却发现什么反应都没有，他终于明白睡狮早已锈蚀，如不能更易新机，则将长睡不醒。梁启超听到这里，联想到自己的祖国依然沉睡不醒，慨然以悲，长叹一声：“呜呼！是可以为我四万万人告矣！”

虽然曾纪泽从未将中国比作睡狮，可是，梁启超却多次谈到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指实睡狮论出自曾纪泽。梁启超是清末最著名的意见领袖，文风淋漓大气，笔锋常带情感，在清末知识分子当中极具影响力。而曾纪泽论文的文言版虽曾在报纸刊载，但并没有收入《曾惠敏公遗集》，事实上很少有人能读到原文。

梁启超写作《动物谈》时，正流亡日本，因而睡狮论最早是流行于日本留学生当中的。1900年之后的几年，待唤醒或被唤醒的睡狮形象已经被赋予了唤醒国民、振奋民族精神的象征意义，反复出现于各种新兴的报章杂志，尤其是具有革命倾向的留学生杂志。

清末民族主义者之所以宁选睡狮不选飞龙，除了将龙视为腐朽朝廷的象征物，还与龙在清末所负载的各种负面形象相关，正如丘逢甲诗云：“画虎高于真虎价，千金一纸生风雷。我闻狮尤猛于虎，为君画狮勿画虎。中国睡狮今已醒，一吼当为五洲主。不然且画中国龙，龙方困卧云无从。东鳞西爪画何益？画龙须画真龙容。中原岂是无麒麟，其奈潜龙方勿用。乞灵今日纷

是不可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军委二局在破译敌人密电方面干得非常出色，居功至伟，为保存红军实力立下了汗马功劳。

举世震惊的辽沈战役中，毛泽东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兵不厌诈隐真示假，情报工作再一次发挥了无比重要的作用。

辽沈战役是一场“关门打狗”的空前规模的大歼灭战，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我北满、东满数十万人的大军南调锦州方向，以形成关闭东北大门之作战态势，东北野战军司令部通过了匠心独具的作战方案：“我军以4个师的兵力向南开进，作出佯攻沈阳之假象，将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东线上来，而我攻锦大军则趁机暗沿四平、郑家屯、阜新西线迅速南下，出其不意地进入锦州地区。佯动过程中可用257号电台编造假情报，隐真示假骗敌上钩，配合我军攻锦行动。”“佯攻部队则要偃旗息鼓、暗度陈仓，不准走漏任何消息。”就在电波的往来周旋之中，在国军的分析辨别之中，人民解放军军心悄然如期完成了几十万大军人员、粮秣、弹药等军任务务。

辽沈战役全面打响后，解放军巨炮裂空，重兵卷地，取锦州，克长春，势不可挡。当战役发展到歼灭廖耀湘兵团防止其与葫芦岛之敌南北会合时，野司适时指示257号电台向敌发出“共军有两个纵队向山海关开去”的假情报。电报发出后，廖耀湘兵团南逃恰与我辽南地区的独立第2师迎头相遇。廖耀湘误认为与我主力部队遭遇，匆忙转向营口逃窜。257号电台又迅速发出假情报：“共军有大量轻骑兵向营口开进。”目的是加重廖耀湘的顾虑，阻止敌人从海上逃跑。这些电报造成了国民党高级指挥官决策上的顾虑，有效地牵制其军队，使人民解放军能够全歼东北之敌、取得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

(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	张维峰
------	-----

钻龟，七十二钻谋者众。安能遍写可怜虫，毛羽介鳞供戏弄。”在诗人心目中，龙这条东鳞西爪的可怜虫，早已成为供人戏弄的对象，只有威武的狮子，才能用来代表祖国的形象。

睡狮论的传播

庚子事变之后，新兴知识分子萌生强烈的启蒙欲望。唤醒睡狮，以醒狮作为未来国旗、国歌的形象，逐渐成为清末革命家的共同理念。许多著名文人如高燹、蒋观云等，都曾创作《醒狮歌》。1904年4月出版的《教育必用学生歌》，收录了18篇“近人近作新歌”，其中就有《醒狮歌》两篇、《醒国民歌》一篇、《警醒歌》一篇。

20世纪最初几年，东京留学生明显掌握了民族主义革命的启蒙话语权。邹容和陈天华两位烈士的宣言式遗著，不约而同地使用了“睡／醒狮”以象征亟待崛起的中华民族。这是清末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两本必读书，影响非常大。

邹容《革命军》直接将中国比作睡狮：“嗟夫！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据说此书在上海出版之后，“凡摹印二十有余矣，行道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两购之，置瓮中，杂衣履簪钗以入，清关邮不能禁”。

陈天华的未竟遗著《狮子吼》更是洛阳纸贵。作者写自己梦见被一群虎狼追赶，乃长号一声，山中有有一只沉睡多年的大师，“被我这一号，遂号醒来了，翻身起来，大吼一声。那些虎狼，不要命的走了。山风忽起，那大师追逐电似的，追那些虎狼去了”。作者还梦见两面大国旗，黄缎为地，中绣大师；又见到一本大书，封面画一大吼狮子，题曰“光复纪事本末”。

醒狮符号得到了清末革命家的频繁使用。1905年，部分留日学生创办《醒狮》月刊，渴望能将醒狮形象写入未来新中国国歌：“如狮子兮，奋迅震猛，雄视宇内兮。诛暴君兮，除盗臣兮，彼为狮害兮。”此后，各种以“醒狮”命名的爱国期刊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如上海狮吼社先后发行的《醒狮》半月刊和《醒狮》月刊，山西大学曙社的《醒狮》半月刊，中国青年党醒狮派的《醒狮》周报等。此外，长沙、兰州、天津等地，均成立了以“醒狮”为名的青年社团，发行以“醒狮”为名的爱国期刊。

佛教用语中早有“狮子吼”一说，据说狮子吼则百兽惊。抗日战争期间，著名高僧巨赞法师曾在桂林创办《狮子吼月刊》，宣扬抗日救亡，在佛教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正因为醒狮符号暗合了传统文化中狮子吼的正面内涵，新概念得以毫无阻碍地与人们固有的心理图式重合在一起，得以迅速传播。“睡狮—醒狮—狮子吼”，代表同一主体的三种雄狮状态，自然也就可以用来指称同一主体——中华民族。(施爱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来源：人民网)